



另一番反思

郑庭河 《南洋网 佛学版 2002/10/15》

我有话说

佛教徒们敢于对大师的传记内容提出质疑，应是一个很积极的发展，有助于提升佛教界的民主化进程。

针对台湾佛教僧尼传记被质疑为“隐恶扬善”的课题，我认为是十分值得大家作一番反思及讨论的。虽说学者江灿腾批评的是台湾佛教的现象，但未必就与我国的佛教界无关。这除了因为我国的汉系佛教与台湾的佛教源于同一传统之外，也由于某些本地的佛教组织其实就是台湾一些组织的属下分会。

我想在还未因“隐恶扬善”的课题而感叹一番之前，我们首先要为台湾佛教的继续蓬勃发展而感到欣慰。如不是这一番发展，恐怕今天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的僧尼传记，遑论还可以成为畅销书。

第二，虽说佛门人物传记并非什么新鲜事物，但我们在这课题上所指的传记品种显然是最近的产物，是台湾佛教近些年努力开拓发展之下的最新成果。由于它的新，正表示它应该有许多可以提升改进的地方。如此看来，我们本就不应要求这些传记著作完美无瑕，也不应理所当然的认为因其关系“佛教”，就必须一出手就无丝毫错漏偏颇之处。是以批评，更应该被视为让原作者，或其他人下回可以写得更好的珍贵回馈。

我们知道许多伟人的传记，如《孙中山传》，或《马哈迪传》，都是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时代一写再写的。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资料、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来写某一公众人物，应该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事。要求单一个作者写得非常的客观恐怕是有点苛求，更合理的做法应是鼓励不同的作者来写同样的人物，那人们就可以从不同作者的不同成果中来捉摸到一个比较客观的人物形象和评价。

由于读者会批评审判，认真的传记作者就会相互竞争以搜集更完整、可靠、具权威性的资料，以及更用心去做分析和理论上的工夫，所以传记的内容应会趋于更客观、确实、全面。不过，这种发展需要时间，亦需要读者的支持。若读者很快便对某公众人物失去了兴趣，那更客观、确实，全面的传记恐怕是难以实现——除非是兴趣转植到了学术界里

头去。

最后，我认为佛教徒们敢于对大师的传记内容提出质疑或批评，应是一个很积极的发展，有助于提升佛教界的民主化进程。而一个民主的佛教应该会是一个更健康、更有生机、更能茁壮成长的佛教。如果大师们，或大师的拥趸们对批评和质疑都无法开放、宽容面对的话，那会是一个很不乐观的示范。